

广东作家论

第一集

花城出版社

广东作家论

广东作协创研室 编

广东文学节办公室主编

粤新登字 05 号

广东作家论

广东作协创研室 编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市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2 插页 170000 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5360—1993—9

I·1694 定价 7.50 元

献 辞

陈国凯

举办广东文学节是个创举！

提倡文人有文，文学有节；反对文坛上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主义！

在严肃文学困坐愁城，低俗出版物得意扬眉之际；当文学圈子还咀嚼着个人小小悲欢吁长嗟短之时，广东文学节着力组织广东作家面向时代、面向社会、面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认真撰写作品，并筹资将数十本反映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一齐出版推出，不失为一种壮举！

时代呼唤文学；文学呼唤正气；文学呼唤大风之歌！

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写在广东文学节的旗帜上，写在广东作家们的心坎里。

文学之树长青！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目 錄

序	蔡运桂(1)
陈国凯论	郭小东(5)
杨干华论	游焜炳(24)
欧阳翎论	郑心伶(42)
程贤章论	黄伟宗(49)
余松岩论	展 锋(68)
王杏元论	黄景忠 郑培亮(85)
沈仁康论	温 波(97)
范若丁论	陈 实(110)
西 彤论	陈绍伟(124)
易 征论	司徒杰(138)
杨羽仪论	陆 环(149)
何卓琼论	司徒杰 苏 芸(168)
吕 雷论	钟晓毅(180)
洪三泰论	傅腾霄(194)
后 记	(214)

序

蔡运桂

省作协创研室的同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把第一辑的作家论组织编辑出来了。这一辑的作家论，收入了广东成就较为突出的十几位作家，大多数是中年作家。尔后还要继续编下去，逐步展示广东作家创作上的成就与不足。

以单篇文章写作家专论，是一件较为艰难的工作，比评论一部作品困难得多，也显得更有分量、更有价值。作者必须了解作家的创作经历，要阅读作家大部分作品，只有做好这基础功夫，才能对作家的创作成果进行有根据的梳理、缕析、判断，作出较为准确的评论。这样的研究成果，自然有更多的信息量，能揭示、总结出更多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这不仅对被研究的作家，而且对其他作家都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好比一只鸟的两翼，缺一就不能腾飞。广东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曾一度引人瞩目，但近几年有点遭冷落。作家们责难评论家关注不够，即使一些较好或优秀的作品问世，也没有得到反响。这些批评虽不够全面、确切，总算道出作家们希望评论家及时介入的愿望。

广东的文学评论队伍本来不弱，但由于缺乏组织，多数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状态。尤其是近几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文学队伍出现动荡不安，有人投笔从商去了，评论队伍不稳定。因搞文学评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写出文章也难找到发表阵地，要把文章结集出版，还要自己掏腰包或乞求企业赞助，使一些评论家陷于进退维谷之中，有的干脆搁笔，有的向创作接轨了。大学里本有较雄厚的评论队伍，但由于搞经济创收，加重分内教学和额外培训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阅读、研究文学作品，更谈不上写评论文章。有些评论文章，乃刊物或作家本人催写，不想为而为之，象“关系稿”这类文章，大多廉价吹捧有余，科学分析不足，使评论丧失独立自持人格力量，既降低文学评论的威信，又无助于文学创作的提高。真正的文学评论，必须独立自持，勇于剖析作品的是非功过，摆脱人情、人际关系的干扰。而且应该鼓励不同声音，开展争鸣，才能把评论引向深入。自然，我们对作家，尤其对青年作家的作品，应多些鼓励，发现其长处，不求全责备，更不要专门挑其短处，大加贬谪，挫伤其锐气。

当一名称职的、有权威性的评论家，很不容易。评论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虽然在艺术技巧上比不上作家，但必须具备渊博的文学理论知识，必须对社会、人生、现实生活有深刻的认识、理解，必须具备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价值观。这样，才能对作家作品作出较为正确的有价值的科学评价，并有助于引导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我们既反对刻板的、教条主义的评论，也反对随意式的、毫无科学性的信口开河。评论家既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要有独立自持人格力量，也应该有包容精神，不应以个人的爱好来评判作品的优劣。既要提倡表现主旋律、振奋人民精神的优秀作品，

也要鼓励多样化，让各种不同风格、流派，不同题材、体裁的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竞芳斗艳，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广大读者的精神需要。对作家来说，也应该以包容精神对待评论，不能喜听赞歌，不喜欢逆耳忠言。外科医生在病人身上开刀，看来是残忍的，但其动机与效果是治病救人。严肃的评论家对作品的尖锐批评，也是外科医生的精神。只有作家评论家在对待文学评论上取得共识，才能促进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发展。

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应该包括认识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娱乐功能等三方面，并根据作品的类型、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作出恰如其分的价值判断。在“左”的文艺路线统治文坛的时候，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着眼于政治、思想、道德价值判断，而忽视了艺术价值和娱乐功能。但今天有些文学批评走向另一极端，忽视甚至藐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在所谓“文本”意义上进行形式主义的评价，甚至把违背现实生活，违背语言规律的某些文学现象大加赞赏，视为艺术上的突破。这也是不可取的。从文学艺术的发展来看，评论家应该不断扩大视野，应该善于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学艺术形式以及有助于文学艺术发展的独特文学见解和理论，当然也包括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中有益的东西。我们既不能把“传统”视为神坛，至高无上，也不能把外国的一切文学艺术都视为瑰宝，为之倾倒。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应该取长补短。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输送美好的精神粮食，各民族的文化仓库中，都有美好的东西可以吸取，也有糟粕要加以剔除。不能为了猎奇，为了追求某种怪异的精神刺激，把西方某些过时的、颓废的文学艺术也加以颂扬、引进。比如西方有些撑的太饱又精神空虚的人，把流浪汉

在公厕里乱涂鸦的东西也当作艺术来展览，我们必须杜绝这种有害的东西。世界各国对于物质上的毒品有一个共识，对于贩毒犯都采取严厉制裁的态度。但对于精神上的毒品却没有共识，也很难确定一个辨别精神毒品的共同标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应该以有利于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作为最基本的要求。凡是符合这个要求的，尽管不是伟大的、最优秀的文学艺术，也可以是有益的文学艺术，文学评论也应该根据这个基本要求对文学艺术作出正确评论。

要发展广东的文学评论，必须建立一支文化素质高的专业评论队伍。既然有潜心创作的专业作家，也必须有潜心搞评论的专业评论家。广东省作家协会正在为建立这支队伍而努力，并在奖励、出版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以便使这支队伍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广东的文学创作与评论两个轮子一起前进，为繁荣广东文学作出更大贡献。

陈 国 凯 论

郭小东

我读陈国凯的小说，日渐强烈的印象是作家的忧患感，一种迫人的忧心如焚而又善良与宽厚的忧患感；一种包裹于重重的时代生活与心理矛盾之中，对人生、对社会、对现实与历史不断发问感悟、反思而后苦闷的象征——陈国凯的创作，尤其是近年来的创作，在隐隐地透露着这种思想与艺术的趋向，我不以为这种忧患，是出于知识分子本性的杞人忧天、或是单纯的针砭时弊所能统括，“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才是作家真正的根性。它贯彻于作家笔下的生活、人物、题材的筛选与抉择，贯彻于作家创作的审美活动、主题开掘和历史把握的全过程。陈国凯小说创作的得与失，盖出于斯，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根柢。复杂隐曲的爱与恨、褒与贬，由此而来评价的公允与偏颇，艺术把握的精当与粗疏，都与滋生于这根性之上的他的文学观念有关。而标志他文学观念明显转移的是《好人阿通》的问世。

把《好人阿通》当作陈国凯小说创作的制高点，理由是相当充分的。这部小说尽管在评论界未引起强烈的反响，但与陈国凯在这之前的得奖小说《我应该怎么办？》和《代价》相比，《好人阿通》在思想的新锐与艺术的成熟上，都是属于更深层次的作品。它的高妙之处以及在他创作道路上的重要意义，时到今日，我们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在这之前，陈国凯与许多中年作家一样，他们都经历了两个令人难忘的历史阶段。

“文革”之前，他们正当青年，正统的文化心理和革命传统教育，文学之于他的任务是纯粹的歌颂。他以欢快的、无忧无虑的调子歌赞着新人新事。他这个时期的作品，虽然显示了陈国凯作为一个工人作者起步不凡的许多优点；取材角度的新颖别致，富有生活情趣和实感，平中见奇的故事情节以及幽默轻松的语言表述等等。但是，时流的文学观念和政治状况给入世未深的陈国凯的笔，注入的是对现实的一般性认识，这种文学观念无情地隐去了现实中非理想、非浪漫的东西。他没有也不可能剥开生活的表象，去写出生活严峻的一面，展现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此刻，他对文学的忧患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单纯的社会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去歌颂时代与人不同凡响的美质。与同时代的许多描写现实的作家作品一样，他凭直觉写出了生活的体验，写出了美得炫目的人。如得奖之作《部长下棋》，写一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宣传部长独特的工作作风。他的出身、经历与社会认识决定了他当时只能够跟着时代生活的脚印亦步亦趋，而无法超越和站在它之上。这是他那一代作家的遗憾，同时也是文学的悲哀。十年浩劫使无数人变得愚蠢也变得聪明。陈国凯自然是受害殊深的人物。但是噩梦过后的惺松，并未使他从长期形成的文学观念和固有的文化背景中超脱出来。他仍然在惺忪中蹒跚。写于1977—1978年的《女婿》、《家庭喜剧》、

《学生》、《眼镜》、《结婚之后》、《开门红》等，仍然摆脱不了“好人好事赞”的束缚。虽然在思想艺术上有明显的进取。比如有相当影响的《开门红》，在塑造“典型”问题上所作的探讨，在捕捉南国时尚变化方面都有一种报春的信息感。但构成这一切的故事框架和生活基础却是一对青年男女除夕之夜去迎接“开门红”，这在创作动机上就未免过于牵强。作家的责任感轻滑于陈俗的文学规范。《龙伯》、《家庭喜剧》也莫不如此。主人公余乐天与龙伯，依然难以用独特的丰彩挣脱大公无私、严于律己的老劳模范式。

《我应该怎么办?》、《代价》的出现，使陈国凯的小说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一切都回到了现实主义的轨道。现实撕开了赤裸的胸膛，展示了它淤伤已久的血肉模糊。如果说，文革前驱迫陈国凯创作使命感的，是过多地填塞着一种单纯得近于透明的对于文学的追逐的话，而此刻，民族的累累伤创和茫茫的前路是他产生无穷的忧虑与困惑的触媒，那么多的人间不幸，那么多的倒行逆施，如何能够平息他的忧患！他必须真实地记下这一切。他对现实观察的大胆与尖锐，他那从单纯朴素的笔风突转而为深沉、悲凄的愤懑，都来自他长期被压抑、被掩藏的良知的苏醒，来自时代生活的感应与文学的机缘。这种突变，其实是作家思想认识在一种新质基础上对旧我的延续，作家执著的使命感，是这种延续赖以存在发展的关键。这两部作品，以其现实性的撼人的艺术力量获得许多读者。在揭示特定环境下悲剧的社会原因的现实性上，在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在雕塑女性形象上，是陈国凯以往作品不可比肩的。也许是太拘泥于真实了，缺乏艺术的浸润，反使有的情节扭曲为艺术感觉上的虚假。《我应该怎么办?》，生活中实有其事，文学史上也有过类似的题材。但他还没能比它们处理得更好，更技巧因而也

更真实一些——揭示特定时代生活中非凡的心灵扭曲下的人生的历史成因。他太愤懑，太急迫也太匆忙。他难以节制地喷发了。他这一声带血的嘶喊，应合了当时社会需要。为了惊听回视、为了悲剧更悲、为了取得“爆炸性”效应——这一切都达到了。而冷静一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真实性的极大涵盖面，这是“伤痕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代价》中，女主人公余丽娜易嫁仇人的情节以及最后自寻短见，也与上述原因相同，显得悖于常理，影响普遍的沟通。

陈国凯这突发性的狂飙，还表现了他性格中豪勇与硬骨的方面。实证了他始终是把文学当作人民的喉舌，为弱者立言。但艺术终究是艺术，它需要冷静的客观。在狂飙过去之后，他写下了一些过渡性的作品：《无题小说》、《三杯酒》、《家庭纪事》、《洪主任上岗》、《你调不了我的心》。这些作品，思想上显得深沉成熟，艺术上回复到原先的单纯朴素和幽默讽刺，他的忧患表现为思考。“当我回过头来看看近年来写的这些幼稚的作品，我又开始意识到：应该冷静下来，不要滥用自己的热情了。”应当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观察和思索”，“从零开始”（《家庭喜剧·后记》）。

于是，事隔一年，他写出了《好人阿通》。

二

如果我的艺术感觉没有错，比较接近作家的创作心境与实际的话，则我所感觉到的陈国凯的忧患，这种评论家们称之为社会责任感或历史使命感的東西，在陈国凯近年来的创作中，是以另一种更为含蓄深邃的方式运行的。他的创作，终于走进了

历史的深巷，标志是长篇小说《好人阿通》的问世。

《好人阿通》是陈国凯在自己长期耕耘的题材领域中，对创作对象的一次从根部开始的总体考察。从他的成名作《部长下棋》等一系列写工厂生活的短篇，到《好人阿通》，他始终在探索的一个主题，便是工人阶级内部人的关系的合理性与均衡性的追求。他的小说针砭也好，歌颂也好，都立足在对人的关系的批判、调整与肯定上。重在揭示领导者与工人、工人与工人，在一种较为稳定的政治态势中的种种不稳定，乃至尖锐的矛盾冲突。这种追索一如既往，但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深浅度，诸如《开门红》、《眼镜》等等，矛盾的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对于时尚的冲击意义，而未较深刻的升华为对于整个时代启示的普遍意义。到了后来的几部中篇，作家已经比较明确地在种种人际关系中，注入了他的忧患，勇敢而犀利地表现了他对工厂改革进程种种弊端的深长思虑，甚至对于某些官僚主义的愤怒了。尽管他的愤怒，其方式是相当温和的。阿香姑娘之所以放浪形骸，如无羁野马；阿莲之敢于当众出了处长的丑，这些昔日弱女子的崛起，已经不仅仅是她们本身性格使然，已经让人感觉到愚昧时代的精神意识正在一点点的剥蚀、崩溃，而一种明朗的、蕴含着时代变革的新的性格力量，正在迅速生长，这正是改革的真正希望所在。虽然陈国凯在这几部小说中，还未真正掘发这种来自生活底层的普通人，作为改革家形象出现所应具备的种种素质，但是，他明确而犀利地诱发并形象地抒写了这种强烈的改革要求和呼声，这几部中篇，可视为是作家对处于改革中的工厂生活、工人精神意识的扫描，意味着陈国凯对于工厂改革的思索，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进行历史的追究，改革事关工厂的兴衰与工人的命运，改革主要的、也是大量的工作，仍然是唤起民众，是对于诸如阿香姑娘般的青年工人改革愿望的尊重、珍

视乃到谆谆的诱导。离开了这一工人主体的精神更新，改革是孱弱的。《好人阿通》正是在这一思索的基础上，进行较为深广的追索。

近年来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中，走出了一批改革者形象，以其磅礴的气势威震文坛，传导出了时代强人的气魄，和中国工业体制改革迅猛的足音。大刀阔斧，从上而下地推行改革方案，改革与保守之争，改革家们登台之后的分化、改革家的战场生涯与日常生活等等，给长期以来沉闷于“车间文学”和“证明文学”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带来了生机和新的突破。蒋子龙、张锬、水运宪等的小说，莫不如此。然而，毋庸讳言，描写改革及其改革家形象的文学，也似乎有了新的模式。我们的许多改革文学，似乎重在表现几个改革家的功绩，过分宣扬了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我绝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普及中国大地的改革，更是唤起民众的事业，更是民众的事。是一种民众觉悟的普遍提高，在这点上，我们的改革文学是回避的，忽视了这个民众觉悟的根本问题，无法展示改革的真正痼疾所在。由于执著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现实问题，着眼于改革的现状，“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而未能超越现状，从民族传统思想的积淀上予以艺术的浸润，文学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急于为改革难症开药方。这样的作品可能发聩于一时而难以滋润于长久。忽略了文学对于社会问题的更为深厚的意义，是对客体作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追踪溯源，揭示事物的本源而扬抑。这才是真正的“医治”。有生命力的艺术，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陈国凯的《好人阿通》，正是试图对当前澎湃于中国大地的工业改革浪潮的主体——中国工人阶级，作客观的历史考察，以此揭示中国改革的最根本的阻力，乃来自深藏于改革者本身的民族的痼疾的国民的劣根性，以及所面对的改革难题

之中，蕴含着民族文化素质的匮乏。

《好人阿通》是作家多卷本长篇小说的第一卷。作家整个创作的总体构思如斯。在第一卷中，虽然时间下限仅止于大跃进，但在“题叙”与小说主人公的已知命运之中，我们已能窥小说之全貌。已能预知小说所将展示的，那一幅令我们每一个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至今仍然震栗与痛定思痛的画面。“从农村到城市”，这是小说主人公阿通的道路，自然也中国工人阶级的道路。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历史道路所提供给我们的历史经验。

作家无边的忧患，睿智与深长的思索是以这种历史经验为前导的。长期的基层生活和对于中国文化意识的关注，使他不无忧虑地意识到，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业体系和领导机构的种种改革，在工业建设中，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忽视基本队伍的思想建设，漠视工人阶级的自我改造，实现四化将是很难的。这个思索太重要、太有意义。他从历史的回顾中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复杂成分：“那年头，从农村浩浩荡荡进城当工人的不计其数，产业工人队伍一下子激增二千万，他们成了中国产业队伍的重要构成部分，大量的农民意识、农民作风、农民的美德与缺点，带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了。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特点，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小说主题的这个思想焦点，是中国工人队伍实际情况的凝聚。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幅员辽阔的农业国，小农思想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大工业来得很迟，血统的工人阶级不多。如今庞大的产业大军是解放后才形成的。像阿通这样由农民而工人的人，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有着农民的美德：质朴单纯、革命性强。但盲目性和小农意识也是非常浓厚的。这种思想状态，如果缺乏正确疏导，在极左路线与思潮的煽动和利用下，很容易恶性膨胀，转化为破坏力，危及革

命事业。这种惰力，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给革命和个人带来了损害，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工业建设中，也不可轻视。作家正是将其深广的思索，凝聚在阿通这个艺术形象上来昭示。对于阿通的种种同情、批判、否定、肯定，目的都在于呼吁要重视人、了解人的历史与现状，进而教育人；在于指出阿通们不应该是革命的简单工具，而应该是革命的主人，应该使之具有真正工人阶级的思想与文明，作风与气魄。倘若我们一开始就意识并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则纯朴善良、革命热情勃发的农民阿通何至成为时代的悲剧人物，何至闹出许多害人及己的活剧。《好人阿通》虽未正面明确展现四化建设的矛盾冲突，但作品立意在未来，具有一种从悠久的历史深巷中绵延而来的文学警策与洞知。

《好人阿通》的追索，呈现了沉稳地切向历史深层的态势：现实生活的一切矛盾，都是历史文化与现象的延续，都受到传统的国民劣根性的制约与束缚。这种创作思想的自觉意识，是作家的创作发生质的转换的契机。到此，陈国凯的小说已告别了一般单纯文学意义上的范畴，而开始进入一种“半文化状态”的小说境界。也许从总体来说，我这结论为时尚早，但阿通的形象昭示了这种结论依据。

三

阿通形象塑造的基本思想，是作家近年来逐渐领悟而仍然为一些平庸的创作者忽视的问题：五四以来的社会革命，可以说都是先从文化开始的。不祛除厚重的文化传统的痼疾，社会改革无法前进一步。目前我们许多改革上的困难，正是由于文化积习所致。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意识体系的保护和引导，